

* 專題演講 *

現代詩經學的發展與展望*

夏傳才**

一、遺產：財富和包袱

詩經學在中國有兩千餘年的歷史，經歷漢學、宋學、清代新漢學和「五四」以後現代詩經學等發展時期。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文化，每個時代的詩經學都是在其時代的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對傳統學術的繼承、革新和發展。

「五四」以前的傳統詩經學，主要表現形式是傳、序、箋、疏之學，它是古代社會政治經濟的反映及其科學文化發展水平的產物，總括地可分訓詁、考證、義理三類內容。

訓詁，是訓釋詞語以及疏解章句，以訓釋為中心，發展了訓詁、文字、音韻、校勘之學，稱《詩經》小學，名家輩出。

考證，是對名物、典章制度、歷史地理和有關內容的考據，版本、輯佚等學術也可以歸於其中。考證學由宋至清，迄乾嘉學派達於全盛，有許多寶貴的成果，也有一些煩瑣無用的考據。

義理，是通過詩旨和內容的闡析發揮倫理道德思想，它們是古代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多仍可以作為思想史、文化史的資料；也有一些關於詩經學基本問題的論說，如關於《詩經》的編訂、流傳、時代、地域、詩序、體制等等，至今仍是詩經學的傳統課題。

總的來看，《詩經》的藝術研究比較少，在疏講中有一些點評，而在文學家的其

* 本文為民國 85 年 6 月 13 日在本處發表的專題演講講稿。

** 中國詩經學會會長。

他著作、詩話和文論中有不少論述。

現在能夠見到的古人詩經學的著述約五百多部，還不包括大量的散見於經、史、子、集和晚清以來各種著述與期刊的論述和資料，這是一大筆十分豐富的遺產。

這一大筆遺產，是我們的財富，又是我們的包袱。說它是財富，因為它們是兩千多年歷代古人精神活動的結晶，正由於一代代人以畢生之力的探索，才使我們今天能夠讀懂這部古籍；如果沒有古人嘔心瀝血所作出的訓詁、考據、論證，《詩經》在我們面前只是一串串難以理解的文字符號；前人範圍廣泛的論證，為我們打下了深入研究的基礎，準備了豐富的研究資料。說它是包袱，因為前人的研究，畢竟受他們時代社會思潮和科學文化水平的制約，難免謬誤、不足和偽託。所以，在這一筆遺產中，金玉和瓦礫、真理和荒謬、正確和錯誤、真實和假冒，錯雜在一起，清理精華和糟粕，並加以正確地利用，確實要用很大的力量。如果不加辨析，以偽為真，以誤為正，研究就會陷入迷途。

「五四」以後的現代詩經學，首先是繼承這樣的一大筆遺產，而且，按時代的要求，必然要進行大變革。

二、現代詩經學開拓者的脚步

「五四」先驅者們以民主、科學為旗幟，批判古代經學，當時幾乎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他們提倡科學理論，發展自由研究，解放思想，破舊立新。在《詩經》研究領域，他們順利地完成了由觀念到方法的革新，開拓發展了現代詩經學。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十年時間內，現代詩經學取得以下主要成績：

一、「五四」先驅者們，基本上在《詩經》研究中批倒了傳統經學思想，恢復了《詩經》的本來面目。這次的大批判針對《詩經》中附會曲解的封建說教，解放了思想，開拓了自由研究之路。學者們一致地重新確定了它的真正價值：第一，《詩經》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具有重要的文學藝術價值；第二，《詩經》保留了豐富的上古社會史料、文化史料、博物學史料，真實而可信，具有寶貴的歷史學史料價值；第三，《詩經》的語言是先秦規範化的漢語代表，是研究上古漢語詞彙、詞法、音韻及其發展演變不可缺少的資料，具有語言學的價值。這一新觀念，為知識界所普遍接受而成為共識，從而使詩經學發生本質的變化：由宣揚傳統教化的經學的教材，變為現代人文科學的一門分支學科，《詩經》研究從此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其研

究目的、指導思想、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模式，都發生了重大的變革。

二、在文藝學研究方面，把《詩經》作為一部文學作品，首先是重新解釋一些詩篇的詩義，對一部分詩篇（主要是愛情詩和社會詩）的題旨和內容，作出與前人迥然不同的新解釋，在社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同時，吸取和借鑒西方文藝學理論，比較充分地探討其民間歌謠的藝術特點：音樂性、覆沓性、即景即情的起興、靈活的韻律；三十年代前後，則進展到抒情詩的創作經驗，研究《詩經》的賦、比、興表現手法。進入四十年代前後，總結《詩經》基本創作經驗的〈毛詩大序〉已經編進大學教材。在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下，對《詩經》的藝術研究逐步發展起來。

三、語言學家開始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研究《詩經》的語言。這不僅僅是新術語的使用，而是研究內容擴展，分類趨向細密。在虛詞、隱語、通假、雙聲疊韻、詞彙演變、語法、修辭、音韻、文字各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進展。在這裡，應該特別提出的是聞一多，他依據文學的特質和民歌的特點，繼承樸學的科學成分，借鑒西方民俗學的理論和方法，結合興象的研究，解釋某些系列的隱語，創始了《詩經》新訓詁學，不僅影響了國內幾代學人，其影響遠及日本和歐美。

四、三十年代前後，馬克思主義理論進入詩經學的領域。首先表現於古史研究。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等史學家在史學著作中廣泛運用，並以馬克思主義觀點重新解釋《詩經》中的古史資料，用於研究周代社會形態和意識形態。三十年代初展開的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發展階段問題的大論戰，影響了此後的一代史學。從此以後各家各派的中國上古史著作，無不論引《詩經》的若干資料，連中國學者也如此。

五、現代詩經學並不一概地排斥傳統，「五四」後期的「整理國故」，使學術界重新全面地檢討傳統文化，開展了對古籍的整理和辨析工作。校點排印、辨偽、輯佚、目錄等工作都有成績，若干被時間淹沒的有價值的著作經重新整理出後版（如《詩辨妄》、《詩經通論》）。還有詩經學的傳統課題，包括長期聚訟難決的幾大公案（如刪詩、毛詩序、〈商頌〉時代、民歌問題），學者們開始進行梳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探討，解決了一些公案（如詩全入樂、風雅頌按音樂分類），表現了學術界對詩經學基本問題的認識有所提高。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處於連續十二年的全國性戰爭動亂之中，學術研究缺乏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因而《詩經》研究未能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績，許多研究開了端卻尚未來得及深入和擴展。

「五四」以後的現代詩經學是對兩千年傳統詩經學的繼承和革新，它和現代民

主、科學的進步思潮相結合，對傳統的學術思想、內容和方法進行了重大的變革，閃耀著時代的理論光輝。它開拓自由研究之路，有取有捨地辨析遺產，西學中用地借鑒外來的理論和方法，從總體來看，三十年來，其主流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們要注意到這三十年中有十二年全國性戰爭，能夠正常地進行學術研究只有十八年，取得這些重大的進步，是很不容易的。之所以有這樣的成績，總結經驗的話，我覺得主要有兩條：一條是自由研究，即思想解放，沒有條條框框的束縛，真正做到百家爭鳴；一條是有時代理論的光耀，即民主與科學的「五四」精神，民主，就是反封建，這就有思想性、戰鬥性，科學，就是反迷信、反謬誤，求真求實。

三、「前十七年」的得與失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詩經》研究，是「五四」以來現代詩經學的延續，它的行程是在艱難中曲折前進。

中國學者一部分在大陸，一部分在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在繼續研究《詩經》，並傳承給下一代學者。從總體來看，兩岸同源，都是「五四」開拓的現代詩經學在各個研究方面的繼續深化和擴展。

從五十年代起，中國大陸《詩經》研究，就主要方面而言，最顯著的特色是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理論，而起重大的支配作用；另一方面，過去傳承下來的資料、課題、方法仍然產生傳統的巨大作用。這兩股力量，有時結合或相安，有時則撞擊或排斥。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有它的完整的思想體系，人們對它的接受有不同的心理基礎，學習的程度有深有淺，領會有正有誤，在具體運用時便表現出各種形態，產生各種偏差，乃至難以克服的矛盾。在這種矛盾運動中，四十多年的《詩經》研究的發展歷程，可以「文化革命」為界，分為前後兩個發展階段。我們把「文化革命」前的發展階段，稱作「前十七年」，把「文化革命」後的發展階段，稱作「新時期」。在「前十七年」和「新時期」兩個階段之間是「文化革命」的十年，那是發展停滯乃至大倒退、大破壞的一段人類文化史上最恥辱的時期。

前十七年的頭幾年，百廢俱興，學術文化事業曾呈現興旺繁榮的景象；而隨著政治運動頻繁起伏，後幾年的學苑，百卉蕭條，一花獨秀。總結前十七年現代詩經學的進展，其比較顯著的成績主要在下述五個方面：

一、「五四」現代詩經學傳承的繼續，首先最明顯地表現在從三、四十年代過來

的一大批學者繼續他們原來的課題研究，如于省吾〈詩經新證〉、黃焯《詩疏平議》、張西堂《詩經六論》、陳子展《國風選譯》和《雅頌選譯》^①等專著以及顧頡剛、周予同、朱東潤、王力、錢鍾書等老專家的論文和著述，他們對傳統的傳、箋、疏、注有所訂正、補充，或對詩經學公案進行梳理和研討，或對詩學有所發明，即使在後幾年逐漸封凍的時期，他們仍閉門潛心研究，如王力撰寫《詩經韻讀》。他們並傳承給下一代學者，使傳統的學風綿延不斷。

二、五十年代初有計劃地整理校點古籍，準備全面地清理遺產。這個階段校點重刊的《詩經》古籍八種，（還有若干種製版未及付印），開始重印的大多是有重要研究價值而未能廣泛傳布的著述。^②同時也開始重印二、三十年代的現代詩經學名著九種，如聞一多的三種、朱自清《詩言志辨》以及俞平伯《讀詩札記》、郭沫若《卷耳集》、劉大白《白屋說詩》、李長之《詩經試譯》等，並建立了聞一多遺稿整理機構，整理發表其《詩經》遺稿。這些工作表明了當時重視清理研究遺產，其方向、總體規劃和基本方法都是正確的。

三、確定了在全民普及優秀古典文學的方針，《詩經》被列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源頭而受到重視，出現了大量比較通俗的《詩經》評介文章和小冊子，普及有關《詩經》的基本知識；同時，多種《詩經》選注、選譯、解說也相繼出版。依據當時通過文學作品進行思想教育的要求，對選取的作品進行指導閱讀的分析，這主要是社會詩、諷刺詩和一部分優美的情歌，出現了數量眾多的賞析文章，〈碩鼠〉、〈伐檀〉編進中學語文教科書。這些工作，大大地促進了《詩經》在社會的普及率，提高了人民對《詩經》的認識。例如余冠英的《詩經選注》、《詩經選譯》發行量超過一百萬冊，其他普及性的讀物也大多在一、二十萬冊以上。在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期，《詩經》有這麼眾多的讀者。用長遠的觀點來看，對詩經學以後的發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義。

① 于省吾：〈詩經新證〉，載《文史》第1、2兩輯；黃焯：《詩疏平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撰成於1959年；張西堂：《詩經六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陳子展：《國風選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雅頌選譯》（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② 如顧頡剛重新校訂他校點的《詩疑》（王柏）、《詩經通論》（姚際恆），他主編的《古籍辨偽叢刊》還校點了朱熹《語類》詩經部分、鄭樵《詩辨妄》（輯佚）等。此外還有《風雅逸篇》、《古今風謠》（明·楊慎）、《詩比興箋》（清·陳沆）、《詩義會通》（清·吳闈生）《詩廣傳》（清·王夫之）、《詩經通論》（清·皮錫瑞）等，以上各書均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四、通過對《詩經》作品的鑒賞分析，帶動了《詩經》藝術的理論研究。文學理論家運用新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分析方法，強調《詩經》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探討賦、比、興的藝術經驗。在大學文學理論課程中，「賦比興」列為詩歌藝術的一個章節，表明《詩經》藝術的研究已上升到理論的概括。

五、在歷史學領域，《詩經》中的史料在所有的上古史研究著述中被普遍地研究利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期，因〈噫嘻〉等詩關鍵性詞語的理解不同，在史學界展開一次大辯論，同時也出現了通過《詩經》研究周代社會形態和民俗的論著；從五十年代起，也出現了研究《詩經》農作物資料、天文資料、地理資料的論著。儘管這些研究有些迄今未能作出一致認同的結論，有些研究還存在比附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學說的弱點，但《詩經》的豐富的史料價值得到進一步的肯定，它不僅被廣泛運用於人文科學領域，也進入自然科學史研究領域。

以上只是《詩經》研究在前十七年所取得的主要成績。我們必須同時看到其中存在的缺點和不足，有些缺點還發展成嚴重的錯誤。我們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不能正確解決政治和學術的關係，過分地強調學術為政治服務，並由此而進行政治干預，而且，政治被解釋為「階級鬥爭」，而欲在《詩經》中尋找「為階級鬥爭服務」的東西，必定是徒勞無功，致使許多研究課題被取消，古籍整理研究規劃中斷，一些課題甚至被列為禁區。

二、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各門學科領域的絕對統治地位，一些課題甚至被列為禁區。規範以外的東西都不能存在，而且被扣上「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以黨性、人民性、現實主義（包括積極浪漫主義）作為對文藝作品取捨的原則，要求以「階級和階級鬥爭」教育作為政治標準來分析作品的內容，因而，〈頌〉和〈雅〉的一部分被視為「糟粕」而摒棄，全部《詩經》被肯定的已經不多了。

三、因而，形而上學地以偏概全，「《國風》是勞動人民口頭創作」，《詩經》是古代民歌總集」之類不科學論斷通行無阻，庸俗社會學盛行，出現了〈月出〉，是奴隸主殺害奴隸；〈北風〉是奴隸大逃亡之類夢囈，而且，堂而皇之登上論壇。它們實際上是以新的謬誤代替舊的謬誤，以新的經學代替舊的經學。

尤其嚴重的是，這種學術上的左傾思潮又與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相結合，大批學者從學術論壇上相繼消失。雖然六十年代初曾經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而且不久發展為「文化革命」，真正的學者都成了「牛

鬼蛇神」，《詩經》也被定性為「奴隸主貴族文學」。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四、在撥亂反正的新時期前進

中國知識分子歡呼迎接科學復甦的春天。

新時期撥亂反正，學術研究復興，經過全民性地檢討左傾思潮的危害，終於將政治與學術分開。從總體來看，出現了比較寬鬆的學術環境，《詩經》研究又迅速發展。據統計，從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九二年，大陸出版的有關《詩經》研究的著作和在各報刊發表的論文，總數約 2400 目，其中約四分之三產生在一九八〇年以後。

新時期以來，《詩經》研究的發展情況，基本上是良好的，這從以下五個方面可以證明：

一、前十七年被中斷了的研究課題全面繼續，其具體表現是：

1. 經過長期潛心研究，老專家的專著相繼出版，如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黃焯《毛詩鄭箋平議》、朱東潤《詩三百探故》、陳子展《詩經直解》、王力《詩經韻讀》、錢鍾書《管錐篇》詩經部分，以及徐仁甫《古詩別解》、郭晉稀《詩經蠡測》、張松如《商頌研究》等等。^③這些著作以深厚的功力，在訓詁、聲韻、詩義詮釋等方面取得創造性的進展。

2. 在《詩經》史料和周代社會研究、語言學、研究學史、詩經學基本問題等方面，相繼出版了一批被評論界認為是代表當代社會時代水平的專著。^④人們較少提及的，我認為趙光賢的史學著作《周代社會辨析》，較多論引《詩經》的史料，也是一部有價值的專著。

^③ 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北京：中華書局，1982）；黃焯：《毛詩鄭箋平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朱東潤：《三百篇探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王力：《詩經韻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徐松如：《商頌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④ 見徐志嘯：〈陳子展先生的詩經研究〉，載《文學遺產》1995年2月。該文曰：「對《詩經》的專題研究，其中代表著作為：張西堂《詩經六論》、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王力《詩經韻讀》、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向熹《詩經語言研究》……各有特色，代表了當代《詩經》研究的時代水平。」

3. 關於詩經學的基本問題和幾大公案，十多年來不斷有重新探討的文章發表。對《詩經》的流傳上溯到春秋、戰國時代及諸子用《詩》，以董治安的系列論文徵引論證最為詳贍。^⑤對賦、比、興的研究，正本清源，與文化學研究相結合，如趙沛霖《興的起源》達到一定的深度。^⑥對詩經學的四大公案（孔子刪詩、毛詩序、〈商頌〉時代、民歌問題），進行了進一步探討，也突破前人水平，取得重要的進展。^⑦

二、注釋、今譯、鑒賞之類著述繼續湧現，質量有所提高。

1. 十多年來，新出版的全注本、全譯本二十部，代表作除陳子展《詩經直解》，如高亨《詩經今注》、袁梅《詩經譯注》、王宗石《詩經分類詮釋》，^⑧各有特色，高著時有新解，袁著徵引詳贍，資料豐富；王著自成體系，於詞義頗多發明。

2. 近幾年，《詩經》「鑒賞辭典」出版了五種，已經不再是局限於一部分愛情詩和諷刺詩，而是全部進行分析研究。通過研究增進了對三百篇較全面的了解，而且以歷史的眼光，漸趨一致地也肯定了〈頌〉詩和〈雅〉詩的價值，表明在認識上發生了大變化。

3. 不著邊際的「新解」、臆說大大減少，庸俗社會學的流弊由盛而衰，逐漸代之以實事求是的學風。有的譯釋態度較為嚴謹，博採眾說，精心辨析；有的賞析文章質量較高，有所表現。經過這些努力，深化了對詩義的理解，大多題旨的解釋可成定論。

三、遺產的整理研究工作正在多方位地展開，主要有三大項內容：

1. 古籍整理，校點排印《詩經》名著十多部，選用好底本影印十多部，其中包括從國外購進流失海外的孤本影印（徐光啓《詩經傳稿》）、發掘很少流傳的著作予以校點重排或影印（《毛詩質疑》、《詩切》），輯佚一部（王安石《詩義鉤沈》）。過去我們對明代詩經學的評述，多以其空疏、略而不詳，經過對明人一批著述的整理

⑤ 代表作有董治安的〈從左傳、國語看詩三百在春秋時期的流傳〉、關於〈戰國時期詩三百的流傳〉、〈戰國文獻論詩引詩綜錄〉，均收入其論文集《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濟南：齊魯書社，1995）。

⑥ 趙沛霖：《興的源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⑦ 這個問題，見拙文〈詩經學四大公案的現代進展〉，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講演稿，1996年6月17日。

⑧ 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0）；袁梅：《詩經譯注》（濟南：齊魯書社，1985）；王宗石：《詩經分類詮釋》（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研究，^⑨充實了我們的認識，補充和修正了某些觀點。

2. 編纂《詩經詞典》兩種、集說集解、索引、目錄共七種，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3. 對與《詩經》有關的出土文物文獻進行整理研究，如阜陽漢簡詩經、吐魯番義熙寫本小雅鄭箋殘卷、東漢魯詩鏡、敦煌文卷、運用殷墟甲骨卜辭，並考察毛萇講學的河間詩經村。

四、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中外文化交流，翻譯外國的《詩經》研究論著，增強了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開闊了視野，引進了新觀點、新方法論、新的研究角度，從而擴展了詩經學研究範疇，這些最明顯地表現在：

1. 《詩經》研究中引進神話學、民族學、民俗學、民歌學等等相綜合的文化人類學方法，正方興未艾。

2. 比較文學的方法已較廣泛地運用，如與日本古詩、印度古詩的比較研究，以及將《詩經》與楚辭、漢樂府等的比較研究。

綜上所述的四個方面，新時期的《詩經》學者，在解放思想、克服缺點、糾正錯誤的前進途程中，展開全方位、多層面的研究。

我們畢竟曾處於幾十年的封閉狀態，又從十年動亂中艱難走過來，特別是學術文化與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絕不是十幾年就能夠全部解決的，一種學術思想體系的興盛和實現一個學科質的飛躍，往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左傾思潮統治學術領域的時間過久，滲透到各個方面，包括我們自己的思想，「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理論上、潛意識上，乃至學術事業的組織管理上，其殘餘影響尚待進一步肅清。

二、學術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學研究，在方針明確之後，主要是要通過學者的個體精神活動來實現，學者本身的素養起決定性作用。目前者專家逐漸凋零，雖然有一批素養較高的學者，詩經學廣闊豐富，有些研究項目顯然將後繼無人。目前還有相當一批研究者的研究起點低，產生低水平的重複，顯示出掌握傳統資料和關聯

^⑨ 如鐘惺、徐光啓著作的出版，以及程俊英、費振剛等人對明代詩經著作的研究。見程文：〈徐光啓的詩經研究〉，《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3月；費文：〈明代反傳統的詩經研究〉，收於《第一屆詩經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河北大學出版社，1993）。

學科知識的功底淺，論文力度薄弱，缺乏當代理論思維的光輝。因而，培養一代新人，是十分重要的，不然將發生斷層的危險。

三、任何精神活動的產品必須解決它的物質載體問題，推動《詩經》研究的繼續發展，必須解決它的論著、論文的出版、發表和促成古籍整理規劃的實現。這個問題，現在已成為繁榮詩經和各種人文科學研究的最突出的矛盾。

五、我們所了解的臺灣的《詩經》研究

近半個世紀，中國學者分隔海峽兩岸，其中三十餘年音信不通。但是，學者之間是沒有政治界限的，我們一直把臺灣同行作為共同為弘揚祖先文化而奮鬥的兄弟。近年來的互相交往，骨肉重逢，使我們倍感親切。

據我們的了解，海峽對岸的傳統文化研究，一直較為興盛。據林慶彰主編的《詩經研究目錄》，一九五〇～一九九〇年臺灣（包括香港）的詩經學者和論文共約 3000 餘目，其數量超過大陸 40%。

從總體來看，海峽對岸的詩經學，也是三、四〇年代現代詩經學的延續。落腳於臺灣的老一代學者，也帶去他們在大陸時所研究的課題、所積累的資料，這些課題和資料，本來與政治並無聯繫。他們繼承科學、民主的精神，繼承樸學、現代語言學、現代文藝學的理論和方法，在詩經學的廣闊範疇內探幽索微，有所發現，有所前進。大致來說，臺灣朋友對傳統繼承較多而批判較少，基礎研究較多而新理論、新領域的開拓較少。許多學者的研究，精審詳當，立論切實。就筆者所知，取得以下顯著成績：

一、首先是在傳統文化研究具備自由研究和社會重視的條件下，繼承了傳統的優良學風。胡適、錢穆等前輩專家，都是國學大師，又具有西學功底，他們倡導尊重傳統而不盲目崇拜，注重實證的科學辨析，在搜羅豐富研究資料的基礎上自由研究，力求有所發明。這種學風成為主流，屈萬里、潘重規、裴普賢等詩經學專家不僅有豐碩的成果，而且傳承了兩代學人，他們的建樹是屬於全民族的。

二、臺灣同行的研究是全方位和多層面的，其中又以詩經學基本問題、詩經學史及歷代名著評介為主要重點，而且起步早，範圍廣，成果多。如對漢今文、古文之爭的宏觀上的評述和各派代表著的具體研究，對漢、宋之爭的梳理，都做到資料豐富，立論有據，有些研究內容在大陸還是空白（如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文幸

福《詩經毛傳鄭箋辨異》、糜文開、江乾益的齊詩研究等等），對明代詩經學的研究超越了前人「明學空疏」的成說，具體評述了明人著作，詩義詮釋，既尊重舊說又不落窠臼，博採眾說擇善而從，有些說解已為大陸學人引用（朱守亮《詩經評釋》）。

三、文獻整理、輯佚、辨偽、目錄索引，臺灣同行做的工作數量比較多，程元敏的王安石《詩經新義》輯佚，較大陸邱漢生輯佚本內容豐富、考據較精確；林慶彰考證《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偽作撰者是王文祿而非豐坊，他主編的《詩經研究目錄》，是收羅近百年來研究論著目錄較為全備的第一本書目，都很有價值。臺灣同行也對敦煌詩經卷子有較多的研究，是大陸基本忽略的項目。

四、關於語言研究，我們認為在臺灣已經形成現代詩經語言學這一學科分支，其特點是把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樸學的傳統方法和民俗學理論融匯在一起，陳新雄的音韻研究、竺家寧的句法研究、余培林的《詩經正詁》都給我們有益的啟發；季旭升《詩經古義新證》在大陸的《詩經》語言學者中很受讚揚。

由於兩岸恢復交往不久，以上所見。當然很不全面，難免挂一漏萬。

總起來看，海峽兩岸的《詩經》研究同源而並未異流。滔滔大江奔流，因受到阻撓，在前進中分成兩股，你在這邊走，我在這邊走，進入平坦的原野終將合流。上海陳子展和台北潘重規兩位先生都研究〈毛詩序〉，他們辨析相同的資料，都作出「衛宏詩序另為一書」的一致結論，就是明證。兩岸的研究都是「五四」以後中國現代詩經學的繼續，都作出了貢獻。若干年後的學術史，是必然合在一起敘述的。林慶彰編的《目錄》將它們完全綜合合編，是很有見識的大家風範。

六、《詩經》研究的轉型期

從九十年代初期起我們進入《詩經》研究的轉型期。

這是「五四」以來中國現代詩經本身內在運作的必然發展，這是新時期以來改革開放深化的必然發展，這是推進學術研究，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弘揚中華文化進步的發展。

正在進行的轉型，有哪些主要特徵呢？

一、《詩經》研究是多元的，以多種多樣的方法論和研究模式向前發展。

我們不能只有一種方法論，不能只提倡一種研究模式。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無疑地，對於認識事物，

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但是，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是一般原理，即認識的共同規律，而各門科學又有其獨立的發展道路和規律。所以，我們又必須尊重《詩經》本身的特質和規律，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與《詩經》研究的具體內容相結合。《詩經》的特質是什麼？它是用先秦漢語記錄的一部中國上古時代的詩歌集，是出自各階層的作者而比較全面地反映周代的社會生活和意識形態，具有文學的、語言學的、歷史和文化學的多重價值。在兩千餘年詩經學獨特的發展過程中，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具有科學性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是前人經驗的總結，（例如必須講究訓詁、重視考證、研究歷史和文化思想史等），凡是實踐證明為正確的傳統理論和方法，我們都應該予以繼承和發展。同時，馬克思主義代表十九世紀人類理論思維所達到的一個高度，一百多年來，社會在進步，科學和人類理論思維較馬克思時代又大有進展，所以馬克思主義也要充實和發展，不能僵化。我們必須吸取人類理論思維的新成就和科學各學科的新知識，豐富和提高我們的認識和研究方法，借鑒各種新經驗和新方法論。所以，我們的《詩經》研究的方法論必須是多元的。

我們的研究模式也是多元的。從傳統的注釋型、考據型、點評型，到現代的社會學分析型、藝術鑒賞性，又發展了近年的比較研究型、綜合研究型等等。這些多樣化的研究模式，都有其研究的層面、內涵和作用，因而都有其存在的意義。傳統的模式可以革新，傳統與現代可以結合，新時代的一代學者應該是人類理論思維的一切優良經驗的集大成者。

二、開展全方位、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

詩經學的範疇已經大大擴展，它具有多學科的、跨學科的性質，而且在現代，每一學科又分支細密，各學科及其各分支互相關係、互相制約，互相促進。因此，我們必然要全方位、多層面、多角度地進行研究。這樣的研究，當前已經展開，並正在向縱深發展。所謂全方位，指文藝學的、語言學的、歷史學和文化學的各分支所包涵的眾多問題；所謂多層面，指表層和深層，普及和提高；所謂多角度，指歷史和現實，正面和側面。所有這些內涵，都值得研究。那種認為《詩經》研究已經難找題目，或者認為除了新方法論和新模式，其他方面都已「山窮水盡」的觀點，經這幾年的研究實踐證明是有缺乏根據的。

三、借鑒國外的新觀念、新方法論，揚長避短。「五四」時代，我們學習外國進步的新觀念、新方法論，如現代科學思想、現代民主思想、以及文學理論體系、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都有眾多的吸取，推動了傳統詩經學到現代詩經學的變革。

成爲大陸近半個世紀學術文化指導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是從外國學來的；強調黨性、人民性、現實主義、典型性、形象思維等一套文藝批評鑒賞的理論、方法和模式，是從前蘇聯移植來的。近年流行的比較文學研究，比較語言學研究，方興未艾的文化人類學研究等等，開始也是從西方引進的。八十年現代詩經學的發展歷程，也是中國傳統學術對西方新觀念、新方法論不斷吸取、借鑒、撞擊、乃至融合的歷程。新觀念、新方法論的吸取，曾經和正在豐富我們研究的內容，推動我們的進步。自我封閉，曾經使我們的觀念僵化、研究模式定型化，在世界文化日益豐富和相互交流逐漸擴大的現代進程中，顯然違背了學術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凡是對《詩經》研究有用的一切新觀念、新方法論，我們都應該「拿來」，這已經成爲當代學者的共識。

根據現代詩經學八十年的發展經驗，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我們走過的彎路，吸取西方的新觀念、新方法論，首先必須與《詩經》研究的實際相結合，只能借鑒，不能生搬硬套；要辨其得失，揚其所長，避其所短，不能囫圇吞棗。五十年代以後盛行的文學批評方法，通過對作品時代背景、作者思想和人格的認識，分析作品的思想、藝術各個方面，是可取的研究方法，對作品所反映的內容進行社會學分析，也不失爲一種可用的方法，但是脫離《詩經》的時代和許多詩篇的實際內容，按照文藝理論批評的黨性、人民性、現實主義原則生搬硬套，便由藝術教條主義發展爲庸俗社會學，對詩經學的發展產生嚴重的弊害。

新時期以來國外《詩經》研究的一些新觀念、新方法論在大陸也產生了影響，我們研討它們的得失，是完全必要的。如美國學者王靖獻《鐘與鼓》，以比較文學方法和帕利·勞德理論來研究《詩經》，注意《詩經》中大量存在的「現成詞組」和「現成思路」現象，並由此而探索和發現其「興義」，有其「得」；但通過《詩經》與歐洲古詩對比，論斷〈周頌〉、二〈雅〉都是口頭詞組詩——口頭文學創作、〈載馳〉口頭詞組達80%因而產生時代最早等等，並不符合《詩經》的實際和中國詩史；帕利·勞德理論本身有自相矛盾的缺陷，中國上古的《詩經》有不同於歐洲中古詩歌的特點，他的「失」，就在於把不具備普遍性的、尚不完全成熟的理論硬套在《詩經》研究上。再如正在大陸流行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從本世紀前期的法國的葛蘭言到本世紀後期的日本學者，他們以異文化、跨文化的視點比較系統地探索《詩經》的深層內涵，豐富了我們對《詩經》的認識，是其「得」；但是各民族的文化及其發展，有共性，也有個性（時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的差異），在共性的比較中可以有所發

現，不了解差異，也就會產生一些錯誤的結論。文化人類學也尚未形成一個完善的體系，而且他們對中國古代史、古代文獻、詞語理解等幾個方面都有疏漏，是其「失」。我們唯有辨其得失，才能揚長避短。^⑩

四、詩經學的基礎研究仍然處於重要地位。

據以上所述，一些傳統的研究課題，如基本問題、詩旨、詞語訓詁、名物考證、異文、辨僞、輯佚、以及古籍整理、文獻目錄等，仍有它們的重要性。這是詩經學的基礎研究，它們不是「山窮水盡」了，而是要在新起點上進行。所謂新起點，就不是對過去研究的低水平的重複，而是在我們時代科學文化新水平的基礎上，利用各學科發展的新成就，對過去豐富的研究遺產加以審視和辨析，存其正、辨其非、解其疑、補其闕，把基礎研究做得結結實實。對詩經學研究遺產的全面清理，仍是長期的艱巨的任務。

多元的、多學科、跨學科和跨文化的、全方位、多層面、多種模式的研究，是《詩經》研究轉型期的特徵。這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任何一位學者，只能在這工程中完成一部分工作。因此，中外學術界必須加強團結合作，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努力協作，把現代詩經學提高到新水平。

中國是《詩經》的祖國，它產生在我們民族文化的土壤上，我們應該做出較大的貢獻。

^⑩ 關於這個問題，我另撰〈國外詩經研究及其新方法論的得失〉。